



张国焘出走内幕

□ 刘 统

匆走了。

从这天起，张国焘心神不定，坐卧不安。如果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，他毕竟还能接受，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。他不会忘记，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，何孟雄、林育南等人就是在王明的打击陷害下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，杀害于龙华。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，也曾杀害过不少红军将领。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，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。从这时起，张国焘就打算叛变革命了。

不久，王明离开延安去武汉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。张国焘仍然当边区政府的代主席。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忙于指挥八路军的抗战，没人理会张国焘。张国焘表面悠闲自得，暗中却在寻找逃离延安的机会。

1938年4月4日，是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的日子。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代主席身份前往中部县，在黄帝陵前见到了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。祭拜完毕，张国焘对护送的人说他到西安有事，请他们先回去，就带了一个警卫员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扬长而去。到西安后住进国民党的西京招待所，却不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。4月7日国民党方面准备安排张国焘去武汉（当时蒋介石政府驻地），张国焘才打电话给林伯渠，要他到车站来谈话。张国焘对林老发泄一通不满，并说他要到武汉去。林老劝他到八路军办事处好好商量，被张拒绝。林老只好回办事处给中央和长江局发报，报告张国焘的情况。

4月8日早晨，长江局收到中央和西安的电报后，周恩来立即与王明、博古、李克农等负责人商量，一定要抢在国民党之前，把张国焘接到长江局来。周恩来把这个任务交代给李克农，要他带着机要科长童小鹏，副官丘南章、吴志坚一道去汉口火车站等待张国焘。

从西安到汉口的火车每日一班，他们一连等了三天都扑了空。11日19时他们第四次接西安来的火车，到站后有的在站口监视，有的上车去找。丘南章找到最后一节车厢，终于发现了张国焘。李克农上车对张国焘客气地说：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我们来接你。张国焘显得十分恐惧，护送他的两个特务见李克农带了武装副官，也不敢动手。李克农陪张国焘坐上小汽车到长江局办事处去，两个特务一个尾随，一个去报信。张国焘坚持要住在外面，死活不肯去长江局。李克农只好给他找一个小旅馆住下，留下丘南章、吴志坚“照顾”张国焘。

夜里，王明、周恩来、博古、凯丰等长江局负责人在李克农陪同下来到旅馆，和张国焘谈话。张国焘表情紧张，语无伦次，说什么边区如同“鸡肋”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王明不同他讨论这些问题，只是批评他，不报告中央就出走的错误，希望他回办事处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。不管众人怎么说，张国焘就是不肯去。最后周恩来要张打电报给中央承认错误，张国焘只好写了一个电报稿：“毛、洛：弟于今晚抵汉，不告而去，歉甚。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。国焘。”交给周带回去发。周恩来说：你既然来到武汉，那就在这里等待中央的指示再说吧。

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启程回到延安后，俨然以钦差大臣和中共领袖自居。张国焘挨过王明的整，对他表示冷淡。但是王明却不自量，在第一次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时候，他没和任何人商量就拿出一张拟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，要求增补人员。王明这种专横的行为令毛泽东和张国焘都很反感。但是碍着共产国际的面子，同意了王明的意见。以后，王明又以居高临下的姿态，与中央领导人分别谈话。

当王明与张国焘单独谈话时，问起在草地的那场争论的症结。张国焘说：“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，可以说是争夺军事领导权。”王明说：“这不尽然，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。”他告诉张国焘：“李特、黄超就是托派。他们在迪化经邓发审问，已招认是托派，并已枪决了。”

张国焘听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处决，痛心地说：“李特、黄超是托派，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！”王明赶紧解释说：“你不是托派，不过受托派利用。”张国焘再也忍耐不住，厉声指责王明把自己同志当托派来清除，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？王明见张国焘神色愤怒，说：“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。”便匆

周恩来等回到办事处后,即向中央报告并请示处理办法。

12日中央书记处复电王明、周恩来等:“为表仁至义尽,我们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,请照转。”电文是:“焘同志:我兄去后,甚以为念。当此民族危机,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,为全党全民模范,方能团结全国,挽救危亡。我兄爱党爱国,当能明察及此。政府工作重要,尚望早日归来,不胜企盼。弟毛泽东、洛甫、康生、陈云、刘少奇。”

周恩来拿着中央的电报到旅馆给张国焘看过,又耐心地劝张国焘到办事处去住,一切都可商量。张国焘说不出什么,只是坚持不肯去。周恩来给他两天考虑时间,只见他给国民党方面打电话,根本没有悔改之意。于是14日晚周恩来、王明、博古、李克农又去找张国焘,劝说无效,李克农便拿出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本事,半拉半拖把张国焘塞进汽车,拉回长江局办事处来。

张国焘搬到办事处后,总找借口外出。他一再向周恩来提出要见蒋介石,向蒋报告边区政府工作。因为张国焘还没被罢免,周恩来不好拒绝。16日上午陪张国焘去武昌见蒋介石。张国焘见到蒋就说:“兄弟在外糊涂多年。”周恩来立即针锋相对地说:“你糊涂,我可不糊涂。”蒋介石看到这场面,也不好多说,敷衍了几句就结束了接见。回到办事处,周恩来严厉批评张国焘丧失立场。张国焘态度消极地说:“国民党没有办法,共产党也没有办法,中国很少办法的。”又说,“我感到消极,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去,我家里饭还有得吃。我此后再不问政治了。”当天下午张又找借口外出,周派吴志坚随从。张国焘在街上转到天黑,又提出要过江去。在轮渡码头,当客人走完要关铁栅门时,张突然跳上船,想摆脱吴志坚。吴志坚早有防备,紧跟张国焘上了船。张国焘到了武昌不肯再回去,硬要找个旅馆住下。吴志坚乘张国焘休息,赶紧打电话通知长江局。办事处正四下寻找张国焘,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把张国焘

拉回汉口。这次张国焘死活不肯再回去,只好把他安排在太平洋饭店住下来。

周恩来等听了吴志坚的汇报,认为张国焘是决心叛党。17日上午,周恩来、王明、博古一同来到饭店,与张国焘作最后的谈话。周对张提出三条,供他选择:1.改正错误,回党工作;这是我们所希望的。2.向党请假,暂时休息一个时期。3.自动声明脱党,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。张国焘表示第一条不可能,可以从第二第三条考虑。并要求考虑两天再答复。周恩来等走后不久,张国焘就打电话约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来饭店谈话,表示了投靠国民党的意向。军统很快派来两辆车和几个特务,两个上前抱住看守张国焘的丘南章副官,一个拉着张国焘上车。等张国焘走了,才把丘放开。丘南章回到房间,看到张国焘留给周恩来等的字条。上面写着:“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,已移居别处,请不必派人找,至要。”丘南章马上回办事处向周恩来等汇报。长江局当夜开会研究,由周恩来起草了给中央的电报,报告了张国焘叛变经过,建议中央公开宣布开除张国焘的党籍。

4月18日,中共中央做出决定,开除张国焘的党籍。4月22日的《新华日报》公开发表了党中央《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》。全文如下:

张国焘已于四月十七日在武汉自行脱党。查张国焘历年来在党内所犯错误极多,造成许多罪恶。其最著者为一九三五年进行公开的反党反中央斗争,并自立伪中央,以破坏党的统一,破坏革命纪律,给中国革命以很多损失。在中央发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后,他始终表示不满与怀疑。西安事变时,他主张采取内战方针,怀疑中央的和平方针。此次不经中央许可私自离开工作,跑到武汉,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表示不信任,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绝望,并进行破坏全国抗日团结与全党团结的各种活动。虽经中

央采取各种方法促其觉悟,回党工作,但他仍毫无悔改,最后竟以书面声明自行脱党。张国焘这种行为当然不是偶然的,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发展的必然结果。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,特决定开除其党籍,并予以公布。

中共中央决定的公布,对张国焘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张国焘没有想到中央会如此果断地处理他,慌忙给周恩来等写信。在4月24日的信中说:“连日因寓所未就绪,故不曾致函诸兄。昨晚即写好一信,拟今晨派人送来。忽阅报上载有开除弟党籍的决定之公布,深使我痛心。……千祈我们间应维持冷静而光明之政治讨论,万一决定不能改变时,亦希彼此维持最好友谊。”

但是,中共中央已经把张国焘扫地出门,没有人再理会他了。从中央决定公布之日,在各级组织和部队中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和教育。同志们在短暂的震惊之后,对张国焘的叛变行为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和不齿。1938年5月5日,延安《新中华报》刊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七号命令,全文如下:

《关于开除张国焘边区政府执行委员及代主席等一切职务事》

本政府执行委员兼代主席张国焘,于本月三日经主席团派往中部谒黄帝陵,即弃职潜逃。在此全国抗战紧急关头,张国焘此种行动,实属有违革命利益和革命纪律。特由本政府执行委员会决定,开除其本政府执行委员及其一切职务。嗣后凡张国焘一切言论行动,本政府概不负责。

主席林伯渠

为了表示对叛徒的鄙夷,这个命令并没有刊登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上,而是在第三版下角广告栏中用一小块并不显眼的地方刊登的。张国焘18年的革命生涯,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开始,最终以“叛徒”的名称画上了句号。

(摘自《各界》

2005年第2期)